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

辉煌的转轨

● 主编 邓先明 胡海 ● 何卓恩 夏勇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目 录

一、百年难圆富强梦	(1)
世纪之梦	(1)
一波三折	(4)
梦难圆	(10)
二、共和国接过烂摊子	(13)
三、第一场战斗：与投机商斗法	(16)
四、三年创造一个奇迹	(21)
五、凯歌行进：“一五”计划出台	(29)
两条腿走路	(29)
7 亿两黄金，921 个大项目	(32)
提前进入社会主义	(35)
六、中国寻求发展之路	(41)
照过去方针办：此路不通	(41)
大转折	(44)
总设计师开处方：改革！开放！	(46)
七、摸石过河——改革开放进程回顾	(59)
凤阳农民血红的手印	(59)
“农村包围城市”	(61)

兴办特区，杀开血路	(63)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65)
干个体，搞私营	(66)
一条线，一大片	(68)
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	(71)
超过八级的改革地震	(73)
南国春风，捅破窗纸	(74)
八、全面转轨：迈向市场经济	(78)
市场经济咋回事	(78)
建构大舞台	(85)
创新企业制度	(91)
不走西方老路	(96)
效率、公平、保障	(100)
法制经济，法治社会	(104)
九、共和国步入辉煌	(108)
翻两番，软着陆	(108)
从匮乏经济到买方市场	(111)
巨型工程，巨型企业	(114)
外汇储备世界第二	(116)
摆脱贫困迎小康	(118)
十、展望新世纪	(122)

一、百年难圆富强梦

世纪之梦

对于上下 5000 年的中国，有人作出了这样的划分：

中国的中国

亚洲的中国

世界的中国

从遥远的传说时代到纷争征战的春秋战国，中国文明处在生成、演化和基本定型的时期，中国文化既不受异域文化的明显影响，同时亦没有显著地影响异域文化，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春秋战国之际逐步确立的中国式的封建经济政治体制，在秦汉大一统的王朝格局下，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秦汉以来，至于隋唐，至于宋元明清（道光以前），中国社会虽屡遭变乱，王朝兴衰更迭不断，但总的说来，中国文明是一个繁荣的文明，高超的文明。从短命的秦王朝开始，中国文化之光就开始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直到前清，中国在

亚洲仍然享受着特殊的地位和尊重，中国人和亚洲人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都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中央帝国之谓也。把这 2000 年的中国看作亚洲人的中国，未为有过。

本来，中国历史还可以按照自身逻辑继续演绎下去——因为中国式的封建体制有三大超稳定系统，即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系统、以家族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父权政治系统、以及儒学为主儒法兼用儒道互补的文化价值系统——意想不到的是，1840 年一支由另一个半球开来的船队用野蛮的方式强行修改了中国的逻辑。鸦片战争以天朝帝国的惨败而告终，地大物博的中国遂成为西方列强口中的“一块肥肉”，不由自主地被拖进了业已形成的近代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一直为中华文化所辐射的周边国家或者纷纷为西方列强所蚕食，或者主动向西方文化易帜，而中国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开始受到越来越深的破坏，沦为半殖民地的境地。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维持了 2000 多年的固有小农经济结构受到强烈冲击并逐渐解体，中国经济也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旋涡。这样一来，中国便成了世界的中国。

站在炎黄子孙的民族情感上，从“中国之中国”到“亚洲之中国”是幸福的，从“亚洲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其过程则是十分痛苦的。1840~1949 年的 110 年时间里，中国人民饱受欺凌和屈辱，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然而，唯其痛苦，才有愤争，才有救国救民之举，才有富民强国之思。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中国人，从“落后”与“挨打”的内在关联中悟出了中国的出路——

不在：挣脱于世界体系，“光荣孤立”

而在：实现现代化，自立于世界

于是，追求实现文明古国现代化的努力化作一代又一代人用思想和行动设计出的一套又一套的救世方案。

林则徐、魏源他们说，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强兵富国；

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们则说，要以商为战，以学为战；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他们说，要维新变法；

孙中山先生却坚决地主张，必须革命！

然而，“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在甲午风云中破产，“商战”、“学战”也没有形成气候，百日维新以谭嗣同们的断头而告终，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封建军阀所窃取。失败，失败，失败……

陈独秀、胡适等人领悟到民智未开，革新难成的道理，于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希望通过建设新文化而达成新体制，推进现代化。

至此，现代化之梦由器用而经济，由经济而政治，由政治而文化，终成体系。

这些方案，今人视之，都不无偏颇，亦不无价值。

说它们偏颇，是因为它们各执一端，而依之而行的每一场运动都没有真正带来现代化的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最深刻的一场运动，直接触及到国人的灵魂，但是，它内部所蕴含的矛盾后来却演化成长达 20 多年的国共两党争取不同民族前途的斗争。

说它们有价值，则是说，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摸索和尝试，而且，对现代化实践的现实进程也或多或少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一波三折

现代化的内容涉及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而经济的现代化（包括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和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应该说是最基础的部分。客观地说，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从鸦片战争一结束就开始起步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发生，“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出自共产主义老祖师马克思之口的这句名言，又一次得到印证。只是由于条件的不足，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得相当特殊，相当艰难。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近代工商业为依托，其中近代机器化大工业是基础，近代商业则是从近代工业中分离出来并为之服务的产业，工业是“皮”，商业是“毛”。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一般先有“皮”，后有“毛”，或者“皮”“毛”共生。但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走到了惯例之外：先生“毛”，后长“皮”。中国的新式近代商业附着于外国工业资本首先破土而出。

中国的新式近代商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逐渐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农产品、原料供应地，即已开始产生。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开埠通商，西方国家在华倾销工业品，使许多经营传统土特产品的旧式商业日趋衰落，一些商人转而经销外国工业品。

在广州，仅回文街等处就开设了近 200 家洋货店。

在上海，1850年在一家专营洋布的布店——同春详货号挂牌营业，随之义泰、协丰、恒兴、大丰、增泰等十多家洋布店相继挂牌。布店之外，还有西药店、颜料店等。

在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产地也出现了新式出口商人，他们直接与外国工商资本打交道，建立从口岸到丝、茶、棉等产区的收购网。

传统钱庄职能也发生变化，由单纯兑换货币转而扩展到存款、放款、办理划汇、签发庄票和贴现等多种的业务内容，向借贷资本过渡。

这些商业已成为世界近代产业资本循环周转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具备了职能资本的性质，只不过它们在这一阶段所依附的不是本国产业资本而已。

为时不远，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也诞生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除了继续把中国当作原料基地和产品市场外，还向中国直接输出资本，在中国投资设厂。这种形势激发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

19世纪60年代，清朝廷洋务派兴办了一些新式军事工业，谋求船坚炮利，这批工业由朝廷供给经费，由政府官员负责管理，还称不上真正的近代民族工业，但却为真正的民族工业出现提供了契机。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一方面为了解决军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问题，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丰厚利润的诱惑和外货倾销的刺激，陆续创办了20多个民用企业，像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汉阳铁厂等，这些民用企业除官资外还吸收了一部分私人资金，带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工业性质。

与此同时，一部分私人资本开始独立创办近代企业。到甲午战前，私人资本独立创办的近代企业达到 100 多家。比较有名的如：

继昌隆缫丝厂	(广东南海 1872)
池州煤矿	(安徽池州 1877)
贻来牟机器磨坊	(天津 1878)
公和永丝厂	(上海 1881)
利国驿煤铁矿	(徐州 1882)
通久源轧花厂	(宁波 1887)
裕源纱厂	(上海 1894)

这些工业企业的资本主要是早期商业资本转化而来，也有贷款、华侨投资、地主投资等。虽然一般规模都不大，100 来家工厂的投资总额也不过 500~600 万元，雇工总数不到 3 万人，平均下来每个厂只有五六万元的资产、二三百人的规模。但它们的生产方式是近代的，中国近代工业由此发端。

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以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封建小生产，以商品化生产取代自给性生产，才能使传统农业过渡到近代农业，使农业成为近代工业的强大支柱。西欧、北美、日本诸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与工业大体同时并进，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步却非常滞后，直到 20 世纪初才出现了通海垦牧公司（南通实业家张謇创办，1901 年，出资 22 万两）、锦州天一垦务公司（浙江富商李厚佑创办，1902 年，集资 60 万两）以及其他一些近代农业公司。

近代商业、工业、农业的生产，标志着几千年的中国经济格局发生重大的革命性变化，虽然它们力量微弱，但却是

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当然，由于列强的压迫，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这种革命性的变化步履维艰，在新中国建立前的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屡受重挫。但它们毕竟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尽管艰难曲折，仍然顽强拼搏。从总体上说，它们还是在发展，尤其有 3 个 10 年，起色较大。

清末 10 年：1901~1911 年。在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努力中，清末 10 年出现了第一次“浪潮”。

1901 年，那个三年前屠杀六君子、囚禁光绪帝、全盘否定戊戌变法的铁腕人物西太后，迫于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 and 政治危机，宣布实行（从内容上看与戊戌变法大同小异的）“新政”，采取了一些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举动，比如支持和保护民间开办各种公司，承认工商业者合法地位，允许商业铁路和集资办矿等。以此为契机，世纪初年的中国开展了收回利权（指被列强攫取的矿山开采权、铁路修筑权等）和抵制外货运动。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产业出现了难得的“振兴”之势。

这 10 年，民族工业的成绩大大超过了 19 世纪末的水准。

——纺织业整体上实现了翻番；

——机器修造业不仅工厂数量大增（逾 150 家），而且制造能力提高，开始摆脱单纯修造小轮船和为外资企业搞散件加工的局面，能够仿制内燃机、印刷机、碾米机、织布机、缫丝机等整机；

——发电厂在各主要城市普遍建立；

——各种新式采矿和冶炼企业达 80 家，资本近 4000 万元，其中大型煤铁开采冶炼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出现于 1908 年，被世界称为亚洲第一雄厂；

——16个商办铁路公司集资5977万元修筑铁路422公里；

.....

商业、金融业发展也较快，尤以金融业为甚。19世纪全国仅1家商办银行，到1911年已有16家银行分布于各地。此外，大量的钱庄、银号也十分活跃，不仅开展信贷业务，还兼营各类商业和运输业。

在农业领域，这一时期迅速成长了171个农牧垦殖公司，它们引进新式农业经营模式进行商品化生产，开了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先河。

民初10年：1912~1922年。清末“新政”下的发展势头由于1908年后朝廷加强政治集权和经济搜刮，重新向列强出卖路矿权以及列强的经济侵略强化而逐渐缓慢下来。但接下来的辛亥革命又一次推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引发了第二个浪头。

辛亥革命以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推翻了绵延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空前提高，民族的爱国热情也空前高涨，尽管革命的“桃子”被军阀摘走，但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鼓励民族工商业的政令还是得以继续执行。而正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暂时得以缓解。这一切，无疑又一次给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提供了机遇，第二个浪头的出现是很顺理成章的事。

据农商部的注册记录，从1912年到1921年6月，全国新办工业和运输企业达764家，资本总额近3亿元。1921年的企业总数和资本总额都比1911年又翻了一番。有些行业发展得尤为突出，例如：

- 纺织业总锭数达到2倍以上的净增长；
- 面粉业从1915年起自给有余，大量销往国外；
- 采矿业中拥有百万巨资的大煤矿由4家增至10家，铁矿产量由70余万吨增至150余万吨，锑和钨的产量分别在1917年和1918年跃居世界首位；
- 轮船航运业的发展无论从企业数、吨位数和资本额衡量，都达到1911年前半个世纪总积累的2~3倍。已有适合江海长途航运轮船109艘，远洋巨轮10艘。

金融业增长更快，1911年底全国16家银行的资本总额为2155.5万元，而到1925年，银行增至158家，资本增至1.7亿元，分别增长8倍和6倍。

从1923年起，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再次减缓。究其因，一是军阀混战局势动乱，加上军政府滥发公债抑制了工商业者的拓宽余地。二是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列强调头东顾，卷土重来。

国府前期10年：1927~1937年。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为巩固其政权基础，推行了保护和提倡国货、奖励私人企业、禁止重利盘剥工商业者、整理劳资纠纷等拢络资产阶级的政策，并通过整顿税制（实行关税自主和纳税制度，限制洋货进口，鼓励国货出口）和改革印制（实行“废两改元”的法币体制，统一货币，稳定市面）等财政经济政策，为近代民族经济的复苏创造了一定的气候。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也有利于全国大市场的初步形成。

5年来陷入萧条的工商业因此而有了重新振作之势。统

计资料表明，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为止，全国使用机器生产的现代工厂达到3935家。以1927年产值为基数，10年间：

- 工矿业平均年增长6.63%；
- 交通运输平均年增长14%；
- 能源电力平均年增长15%；
- 国内贸易平均年增长5.9%；
- 对外贸易平均年增长10.2%；

这种速度在旧中国是十分难得的，故此，这十年常被人称作“黄金十年”。

1936年一般被认为是旧中国经济发展的顶峰。此后中国进入大规模战争时期。经过全民族苦战8年，悍然侵入我国的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接着，蒋介石发动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全面内战，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3年内战变成了3年反独裁的人民战争，诞生了改变中国历史命运和现代化道路的新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

梦难圆

纵观旧中国，争取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历经一个世纪。在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下，总体上呈现出向前发展的趋势，在某些阶段，由于当局的某些积极政策，发展还比较有成绩，出现了几次小“浪潮”。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重视它，承认它。不过，这些发展和“浪潮”都是相对于自己的低起点而言的，换个角度，与有关国家同期水平比一比，结合我国国民经济全局看一看，就会很清楚地看到，整

个旧中国的现代化成就多么可怜。

- 纺织业是中国近代工业最有起色的行业之一，以棉纺纱锭最高年份 1936 年计，共 510.3 万锭，约为同期英国的 1/8，同期印度的 1/2。若按人均拥有量计算，则英、印分别为中国的 77.5 倍和 2.9 倍。
- 钢铁工业从汉阳铁厂建立算起，用了 50 年，才形成 100 万吨钢铁生产能力，而实际产量还远远低于生产能力。1936 年，中国钢产量为 41.43 万吨，是美国的 1/117，平均到人，美国更为中国的 418 倍。
- 铁路交通里程，从 1876 年吴淞线修成到 1937 年，修成的铁路总长才 2.1 万公里，每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只有 21.91 公里铁路，而同期每万平方公里国土拥有的铁路，英国为 1257 公里，法国为 780.8 公里，荷兰为 812 公里，日本为 484.7 公里，美国为 410.1 公里。
- 机械工业，90% 以上的企业是几台机器，几间普通房屋的小厂，资本少，设备简陋。虽也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厂，但都没有制造拖拉机、汽车、飞机的能力。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 1/19。
- 农业现代化的成就更不足挂齿，有限的几百家农牧公司多数经营不成功。现代农用设施在农村的推广也微乎其微。整个旧中国在不同时期进口的拖拉机总数只有 300400 台，每亩地使用的化肥不到 3 两（人称“化肥赛眼药”）。

据有关学者估算，处于黄金 10 年中后期的 1933 年，中

国的国民收入约为 200 亿元。其中近代新兴产业所创国民收入约占 18% 左右，每人平均 2.16 美元。可见，中国作为一个贫弱的传统农业国家的地位并无改变，离现代化的目标显然十分遥远。

旧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波三折、实效不显著的事实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里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要实现百年梦想，只能寄希望于新中国。实现旧中国无力完成的现代化使命，新中国责无旁贷。

二、共和国接过烂摊子

1949年10月1日，随着一个宏亮而厚重的湖南乡音从天安门城楼划破天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政权成立了。中华民族在这一历史巨变中与百年屈辱诀别。现代化的重担落到了新生的共和国稚嫩而坚强的肩上。

这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在人民的驱逐下狼狈不堪地逃离了大陆，开始了维持至今的孤岛生涯。它带走的是人民的唾弃和能够带走的一切财富，而它留下来的却是一份苍白的遗产——一个残破不堪的烂摊子。

旧中国的经济本来就贫弱落后，又经历了连续11年的战争摧残，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点成绩损耗、破坏殆尽。东北曾是旧中国的钢铁工业重镇，1944年美国飞机轰炸东北鞍山等地，日本侵略者强行迁厂，使鞍山成为一片废墟，外国人曾断言，新中国只能在这里种高粱，可见破坏之惨。关内的马鞍山钢铁公司，几经抢劫，高炉竟成了麻雀、乌鸦的巢穴。旧中国的工厂有半数集中在上海，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时，上海工厂遭战火者不下70%，国民政府“迁台时将上海原有90万吨轮船中的74万吨船只劫往台湾，而飞机、航空器材以及驾驶人员则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香港。在炮火的轰炸下，

全国上万公里铁路线(即总里程的近一半)、3200多座桥梁和200多座隧道遭到严重毁坏。到1949年,津浦、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没有一条全线通车,机车有1/3无法行驶。公路通车里程不到原有铁路的80%。

长年兵荒马乱,造成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锐减,仅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实行“三光”时,就屠杀304万人,有340万青壮年被抓丁。国民政府的征兵和抓丁数量也相当惊人,仅四川就达670万人。土地大量抛荒,抗日战争期间抛荒的耕地就在7亿亩左右,内战期间还有扩大。农业生产资料损失也很严重,到1949年全国耕畜减少16%,主要农具减少30%。山林被毁,河堤失修,自然灾害严重威胁农业生产。

工农业生产条件的严重受损,直接造成各类工农产品产量的全面大幅下降。

工业品——1949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旧中国最高产量相比的下降幅度:

生铁	86.1%	原煤	48.4%
钢	82.9%	卷烟	32.2%
水泥	71.2%	布	32.3%
硫酸	77.8%	纱	26.5%
金属切削机床	70.4%	发电	28.3%
原油	62.5%	原盐	23.7%
糖	51.2%	火柴	21.9%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242~248页算得)

农产品——1949年主要农产品产量与旧中国最高产量相比的下降幅度: